

状元:始于唐,宋时最拉风

“状元”一词始于唐代。凡举人进京会试,须先到礼部投状报到,故时人称进士第一名为状元,又称状头。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朝廷开办贡举,考取进士四人,第一名是孙伏伽,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状元。

唐代的状元还不像后世那样令人羡慕。唐代状元并不为史书所特别记录,两部《唐书》里有传的状元,如王维、柳公权、李固言,只称“中进士第”,并不强调其状元头衔。而且,唐代的状元也和其他进士一样,只有再通过吏部考试才能入仕做官。

宋代比唐代更加重视科举,宋太祖亲自进行殿试,钦定状元。殿试的定制,使皇帝成为座主(亦称座师,唐进士对主考官的尊称),他选定的第一名天生至关重要。宋太宗曾亲自写诗赐予吕蒙正、胡旦、陈尧叟等状元。状元及第,立即会被授予重要官职,并且升迁很快。北宋的状元级别可至宰相(同平章事和参知政事),政绩为史家所称道者,有吕蒙正、王曾、李迪、苏易简、蔡齐等。

宋代朝廷竭力给予新科进士各种荣耀。新进士录取后,皇帝一接见并赐宴(如闻喜宴、琼林宴等);诏令宫中卫士为状元清道开路,前呼后拥,公卿以下无不驻足观望,连皇帝也行注目礼。其情景



状元及第牌匾。

之壮观,就连凯旋的将军也大有不及。

北宋殿试前三名均称“状元”;南宋时称为“状元”、“榜眼”和“探花”,并为后代所沿用。状元一词的来历前面已经说明过,而第二名好比榜中的眼睛,故称榜眼。探花则源于唐朝杏园的探花宴选少年俊秀者为探花郎的习俗。

(据《南京日报》)

交规:唐时就有,违规要打屁股

《唐律疏议》中写道:诸于城内街巷及人众中,无故走车马者,笞五十。以故杀伤人者,减斗杀伤一等。

唐朝国都长安是当时世界第一大城市,人口过百万,交通管制肯定是当时政府要抓的一项事务,如今的车辆违规则要贴罚单,严重的吊销执照,在唐朝呢?罚单会不会贴,无法得知,但打屁股是免不了的。

按照《唐律疏议》的规定,在没有任何公私缘故的情况下,在街道和巷子的人群中,快速驾马或者驾马车的,肇事者将处以用竹板或者荆条打五十次屁股或脊

背的处罚。后来,唐太宗听说脊背是人的经络聚集处,因此大发慈悲,将笞刑改为打屁股,所以说这“笞五十”,打的应该是屁股。

如果出现严重交通事故,造成了人员伤亡,就对照斗殴杀伤人的罪行减一等处理。

当然,对于交通事故性质轻重的衡量,也是有量化处理的,唐朝交通法之中的“众”,是指三人以上。而且,因为以下缘故在人群中快速驾马的,可以免于处理:政府公文传递,朝廷命令发布,有病求医、急于追人。如果因此造成人员伤亡的,交钱赎罪,其实就是罚款。

(据《广州日报》)

烧烤:商朝就十分盛行

关于烧烤,东汉《帝王世纪》中就有“纣宫九市,车行内,马行炙”的记载了,《吕氏春秋·本味》中也提到了獾猪之炙是商汤时著名的肉食。这至少说明,商代就有“炙”的品种出现了。

到春秋战国,不但有了羊炙、牛炙、豕炙、鱼炙,还有了貂炙、脯炙、炙鸡等,这在《仪礼》、《礼记》和《周礼》中都有记载。《齐民要术》还专门列有“炙法”篇,收录了北魏及其以前的二十多种炙。以后隋代又有了龙须炙,唐代有了驴驼峰炙、灵消炙、蛤蚧炙,宋代有了江鱼炙、獐肉食、炙鸡鸭、炙骨头,元代有了炙羊腰、炙羊心等。到了明清时期,“炙”逐渐被烧烤的俗语所代替,尽管那时还没有“烤”字。

《礼记》上说:炙,贯之火上。也。《释名》中也说:炙,炙也。炙于火上。也。《说文解字》说得更明白:炙,炙肉也。从肉,在火上。可见古代的“炙”与现代的烧烤完全一样,就是把肉等食品放在火上烧烤。就连调味的方法也与现在完全一样,有的是先将原料腌渍后再上火烤,也有的是在烤的过程中再在原料上涂上调料,还有就是烤好后再蘸着调料吃。穿食物的工具也是木棍、竹签或者铁签等细长之物。

不仅如此,由于“炙”味道甚美,还由五代的王定保《唐摭言》



山东临沂五里堡东汉墓主人“烧烤”画像石图(局部)。

之文,引出了“脍炙人口”一语。“李潜,长沙人也,篇咏甚著,如‘水声长在耳,山色不离门’……皆脍炙人口”。这里的“炙”就不是让人大快朵颐的烧烤了,它是指人的文章写得美,像美食一样让人称赞传诵。

至于“炙手可热”一语,则是说手一靠近,就感觉很热,比喻权势很盛权势很大。此典出自杜甫诗歌《丽人行》:“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杜老夫子看不惯唐玄宗宠幸杨贵妃,任命她的哥哥杨国忠为宰相,把朝政大事全交杨国忠处理,更看不惯杨家兄妹过着花天酒地、穷奢极欲的生活,于是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既描写了杨氏兄妹的丑恶嘴脸,也让“炙”字名扬天下。

(据《广州日报》)

青龙偃月刀:关羽未必用过

托通俗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之福,青龙偃月刀和丈八蛇矛成了史上的明星兵器,它们分别是关羽和张飞的拿手武器。

然而,史上的关羽和张飞未必使用过这两件神器。先看《三国志·关羽传》,找不出关公和青龙偃月刀有一毛钱关系。当然,只要关公神武就行,使什么兵器也就无所谓,咱不能唯武器论。

再说丈八蛇矛,这兵器确实有,东汉学者刘熙的《释名·释兵》一书里就提到它。《三国志·张飞传》里提到“飞据水断桥,瞋目横矛”,长坂坡战役,张飞在当阳桥瞪起眼睛,立马横矛。使的是矛,不是丈八蛇矛。没法考据。其实,只要咱张将军能喝退曹兵就行,管他使什么家伙呢。

不过,西晋末年倒是有一位牛人——大将陈安,能左手使七尺长刀,右手使丈八蛇矛,将关、张的绝活全揽了。《晋书·陈安传》记载他“七尺大刀奋如镢,丈八蛇矛左右盘”。注意了,这可能是史书里第一次提到“丈八蛇矛”。

(据《广州日报》)



军事科学院科研指导部部长皮明勇:

甲午战败实为“文化力”之败

◎ 核心提示

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的武力之战,也是两国的“文化力”之战。武力之战让我们看到的是舰船、大炮和热血,“文化力”之战则让我们感受到思想、观念和灵魂的力量。将武力之战与“文化力”之战结合起来,得到的是更完整的画面、更真实的历史,也更加引人深思,更加让我们的心灵受到震撼。



绘画作品展现的是乾隆接见马夏尔尼使团的情景。(资料图片)



在甲午战争中,相对于中国的一盘散沙,日本表现出“举国一战”的决心。1894年9月,明治天皇将日军大本营迁至距离中国较近的广岛,图为当时的广岛日军大本营。(资料图片)

“文化力”不足,散而不聚焉能不败

“文化力”建立在文化之上。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决定一个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速度,特别是决定一个社会如何应对外来的新挑战新威胁。

甲午战争中,中日两国隔海对峙,中日两军海陆厮杀,一胜一败、完胜完败,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综合的。这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取决于双方“文化力”的差异。

我们观察清朝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可以发现“散”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在朝廷,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不和,主战与主和态度分歧。朝中大臣们各有所图,各执一词。清廷关于对日战争的主要决策往往是多种主张角力妥协的产物,总体上杂乱无法,没有魄力更没有战略智慧。在战场上,湘军、淮军、绿营、练军、海军各成派系,“清军”成为一个复合词,根本没有形成一个有机的力量体系。即使是海军内部,也是南北各分畛域。丰岛海战后,有人建议清政府调南洋舰队北上参战,黄海海战后李鸿章等人再次提议,但终不见行。至于普通民众,更是一盘散沙,对战争漠然视之。甲午战后,一位日本官员到湖北沙市,吃惊地发现在这座长江中游港口城市,官员和民众根本就不曾听说过刚刚打过的战争,他们还完全沉醉于自己的天地里。曾经亲历这场战争的英国人泰来说,此役非中国与日本战,实李鸿章与日本战,大多数中国人于战事尚懵然无知也。李鸿章自己也曾发出这样的感慨,说他是“以北洋一隅之

力,搏倭人全国之师”。如此散而不聚,战争焉能不败!

而清朝上下为什么会如此散漫呢?一方面,是由于清朝政治体制统驭力不强,军事指挥体制效能太差,社会组织发育程度很低;另一方面,又是因为清朝社会严重缺乏共同精神凝结,整个社会对于这场战争没有思想发动,没有精神激励,没有观念引领,官绅军民实际上就是乌合之众。就是说,清朝所缺失的是“文化力”对战争的可靠支撑。民国著名军事理论家杨杰将军一语中的:“甲午战争,不是中国的军队战败,而是思想战败。”

国民意识比拼:心中无国难敌举国一心

国民意识是国家“文化力”的第一支撑要素。国民意识就是强烈的国家认同感、真挚的爱国情怀、为国效命的使命担当。一句话,就是心里有国家。

甲午战争时期,日本的近代国民意识已基本形成。早在明治初年,日本思想家们就开始提出“国民”问题,积极提倡“国民政治”,要求“对外实现国民独立,对内实现国民统一”。当日本决定发动对朝鲜对华战争后,原本存在很大矛盾的日本政府与议会之间,迅速消除了政治上的对立,在战争问题上进行密切合作。在思想家福泽谕吉的劝导下,许多豪商大族表示“不参军也要尽国民之责”,纷纷捐筹巨款。日本多数民众也在“伸张国权”思想鼓动下,被导向支持战争、参与战争,实现了“国民舆论的一致”。根据日本参谋本部编纂的《明治二

十七八年日清战史》统计,1894年1月到1895年11月,日本的66家报社派出114名记者、11名画工、4名摄像师进行战地报道,此外还有许多军方本身派出的军人记者。“战争开始后不久,漫画也要,歌曲也要,都反映出对中国人的憎恶。”通过煽动对中国、中国人的敌意和仇恨,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断高涨,并且走向极端,完成了它的战争动员,增强了它的战争支撑力。可以说,正是国民意识的形成,使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确实做到了举“日本全国之力”。

与日本的情况相反,甲午战争前清朝根本没有进行过全面的国民意识启蒙。洋务运动时期的改良思想家,有的提出要实行政治改革,努力使“民志和、民气强”,但整个思想界对国民问题还没有引起高度重视,“中国人没有独立的国家认同感和忠诚感”。当近代列强并起,中国需要以民族国家的整体力量应对列强的侵略时,这种国民意识的薄弱,就成了一个严重短板。战前日军间谍在多次现地考察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清国“作为缺乏忠君爱国精神之中国,困于财政,弱于军备,其弊可谓已极矣”。甲午战争之后,梁启超在一篇名为《中国积弱溯源论》的文章中说:“是故吾国民之大患,在于不知国家为何物。”

战争观念比拼:和平主义不敌尚武主义

战争观是构成战争“文化力”的重要因素。中日虽然同属东亚国家,但由于各自的生存条件和历史积淀不同,到近代两国兵戎相见时,双方的战争观差异甚是悬殊,并使清国清军在这方面的“文化力”比拼中同样落得下风。

中国传统的战争观形成很早,带有明显的和平主义特征,强调以德立国而不以兵立国,以仁义化育天下而不以武力强制天下,对战争暴力持一种谨慎乃至厌恶的态度。中国人的和平主义给历史上那些曾经深入过中国社会或对中国封建社会有过较深入研究的西方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马可·波罗将南宋度宗皇帝描绘成“和平和正义之友”,说他“既不重视军事,又不鼓励百姓从事训练”。可以说,和平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它建立在对人类生活的高度理解之上,代表着人类理性的较高发展水平。

然而必须看到,传统的和平主

义存在明显功能缺失。由于它在价值观念上对战争暴力持一种否定或倾向于否定的态度,这就使得国家和社会很容易缺乏尚武精神。出于和平主义观念对武力的排斥,中国古人发明了一种“不得已而用兵”、“用兵如吃药”的理论。明太祖朱元璋说:“国家用兵犹医之用药,蓄药以治疾病,不以无疾而用药。”认为军队和战争就好比毒药,只有当国家和社会有病之时才迫不得已用它来以毒攻毒,一旦病好之后便不再需要它,甚至连“药罐子”都要扔掉。这种观念显然会影响人们对战争准备的积极性,影响人们设计战争、参与战争的主动性。中国近代,从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一直到甲午战争,清朝上下在战争筹划和实施上都表现出严重的消极倾向,总是在被动应付,在军事改革问题上也是典型的“刺激反应”、“好了伤疤忘了疼”,无疑是与“吃药军事文化”分不开的。

日本军事文化深受其武士道影响,在近代受西方列强的刺激,迅速地演变成军国主义,形成一种比较极端的尚武主义战争观。这种战争观相对于中国的和平主义战争观,要血腥得多,也强劲得多。甲午战争使中日两种不同战争观在近代第一次正面碰撞,中国的战争文化面对日本武士道式的横蛮,它的无助无力充分显现出来,无论是战场的官兵还是后方的民众都没有从自己的战争文化中找到精神动力。而同一时期的日本人,却被它的战争文化鼓动得众情激愤。为了进行战争鼓动,福泽谕吉发表《日清战争是文野之战》一文,称这场战争“是谋求文明开化之进步者与阻碍其进步者之间的战争,绝非两国间的战争”。他将此役定性为“文野之战”,认为文明淘汰野蛮实属必然,无论采取何种方法都符合“大义”,都是“义战”。这就使日本人在推崇武力、极端使用暴力手段方面找到所谓时代理念依据和心理解脱,变得更加有恃无恐、无所顾忌。

海洋观念比拼:消极“海防”难敌积极“海权”

在决定一个国家“文化力”的因素中,海洋观念同样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中日分别作为大陆临海国家和海岛国家,对海洋的认知和情感明显不同,处理涉海事务的态度和原则也大相径庭,核心是海权意识强弱悬殊。这种认知和情感、态度和原则,直接作用于两国的海军建设,也深刻影响到两国对甲午战争的战略指导。

从地理条件上讲,中国是一个典型的陆海兼备国家,西南高山屏障,北面大漠阻隔,东南濒临大海,中间平原辽阔。这样的地理条件导致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自给自足小农经济高度发达。中国古人利用大陆资源就能够生活得比较好,缺乏向海外进行贸易、争取域外资源的动力。中国这样的地理条件,也决定了在很长时间里所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北方草原。历代中原王朝修筑长城,都在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分界线上。

中国独特的地理条件,与此相适应的农耕经济和军事安全问题,决定了中华民族在文化上始终是面向大陆背向海洋。历朝统治者对海洋茫然无知,普通民众对海洋漠然以对,整个民族严重缺乏海洋意识。特别是进入近代以后,在受到西方列强入侵的情况下,仍然海权观念淡薄,把海权问题矮化成“海防”问题,使海洋的通达性、海军的机动性优势完全没有发挥出来。黑格尔曾站在欧洲远远地观察中国,得出这样结论:“在他们看来,海只

是陆地的中断,陆地的天限;他们和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

就日本的情况而言,虽然它紧邻中国、远离欧美,在近代以前主要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但岛国的基本属性使它在近代接触西方文明以后,越来越愿意将日本定位为海洋国家,特别是迅速接受了马汉的海权论。明治天皇登基不久,就宣示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到甲午战争前夕,在日本海军部和内阁,对海权问题已经有了很深刻的认识。海军大佐山本权兵卫提出重视海权的主张得到认同。山本权兵卫说:“大凡偏处海国,或领有海疆之邦……其无能掌握海权者,斯不克制胜敌以操胜算,此古今东西莫易之义。”从日军所拟制甲午战争作战计划看,它完全是围绕攻击北洋舰队,夺取黄海、渤海制海权进行的,以海权的得失决定其他作战行动。从两军作战的实际情况看,确实是海战决定胜负,海权就是主动权。

科技意识比拼:故步自封难挡科技创新

“文化力”比拼,还有一个方面就是科技意识比拼。科学技术能够物化为武器装备,科技意识则直接关系到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创新。

中华文化重道轻器,在总体上是缺乏科技意识的。最主要的表现,一是把先进科技视为“奇技淫巧”,在心理上排斥、制度上限制;二是对西方的科技发展缺乏敏感性,没有危机感,漠视之冷待之。举三个典型事例。

第一件事发生在1793年。当时马夏尔尼率领英国使团访华,代表大英帝国向清廷赠送了一批礼物,其中有天体仪、地球仪、铜炮、开花炮弹、自来火枪、能载110门火炮的“君王”号军舰模型、望远镜、热气球等。马夏尔尼以为这些物品足以打动中国君臣们的心,出乎其意料的是,清朝君臣们却反应极为冷淡。清朝名将福康安在受邀参观英国使团卫队的新式火器操演时,“意颇冷淡,岸然答曰:‘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演,谅来没有什么稀罕!”

第二个事例,是关于清军火炮技术失传。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并使用开花炮弹的国家(15世纪后半期)。然而,鸦片战争时林则徐和造炮专家黄冕竟然都闹了不知道开花弹技术的大笑话。当林则徐好不容易了解到英军的开花弹技术时,便急忙组织人力进行研究和仿制。一项地地道道的中国人的发明,却在时隔三个世纪后由中国人第二次从西方引进,而当事者竟为之欣喜不已。又过了二三十年之后,左宗棠督兵西征新疆,在陕西凤翔发现了明朝所遗开花炮弹的实物,不禁恍然大悟,发出这样的感叹:西洋“利器”之中土三百余年矣,使当时有人留心及此,何至岛族横海上,数十年挾此傲我。”

第三个事例,讲的是清初火器专家戴梓的故事。戴梓发明了一种连珠銃,也可以叫连珠炮,据记载銃背装有弹匣,可贮存28发火药铅丸。有人称之为早期的机关枪,不免有些夸张,但这种武器在当时确实是比较先进的。可悲可叹的是,当他将连珠銃造出来后,却不敢献给政府,更不敢让清军使用。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在晚上做了一个噩梦,梦中有人斥责他:上天有好生之德,这个武器杀伤力太大,传出去你的子孙一个都留不下。其结果,这个连珠銃就真的没有流传下来。

知道了这些事例,我们就一定能够理解,为什么当年北洋海军成军之后,技术和装备上便都止步不前,不几年就被日本海军赶超,形成舰速、炮速和炮弹威力都不如日军的严重局面。(据《参考消息》)